

屈大均的香山澳門情緣

黃鴻釗*

摘要 屈大均是明清之際反抗民族壓迫的不屈鬥士，嶺南著名詩人和學者。他出身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源地廣州，向來主張解除海禁，發展海外貿易。他特別對澳門表示十分關注。曾兩次專程訪問香山澳門，進行深入考察。他寫的百科全書式的名著《廣東新語》，以及許多詩篇，用生動具體的事例，深入闡述了澳門開埠以後對外貿易的發展，以及對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重大作用。

關鍵詞 屈大均；詩人和學者；澳門；對外貿易；文化交流

16世紀中期，香山澳門迅速崛起，成為國際貿易中心港口後，四面八方的名人雅士紛紛前來訪問考察，屈大均是眾多訪客之一。

屈大均（1630-1696），字介子、翁山，廣州番禺人。他是廣東著名詩人和學者，反抗民族壓迫的不屈鬥士。屈大均生於明清易代之際，深受愛國主義傳統與崇高民族氣節的影響，矢志反對民族壓迫。16歲跟隨名儒陳邦彥讀書於越秀山，治《周易》、《毛詩》及輿地之學，為他後來治學奠定了扎實基礎。18歲的屈大均參加了他的老師陳邦彥等人發動的抗清鬥爭，其後陳邦彥被俘在廣州就義。屈大均偷偷安葬老師屍體後，繼續為反清復明奔走奮鬥。曾寫信導引鄭成功與張煌言舉兵攻入

長江，克江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。又參加吳三桂反清部隊，監軍桂林，但終究復國無望。此後屈大均就隱居番禺鄉間，拒絕為清朝効力。寄情山水，潛心著述。1656年開始北遊，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，有“廣東徐霞客”之稱。旅途中留意山川險阻，志圖恢復。他寫過許多詩歌，才華橫溢，視野廣闊，氣魄雄放，筆力遒勁，富於瑰奇的想像，被譽為“嶺南三大家”之首。屈大均還是博學多才的學者，著作甚豐。其中《廣東新語》一書記述了廣東天文地理、經濟風物、人物風俗，書中集諸史誌之所長，資料翔實，內容豐富，對廣東民俗文化作系統記述，是一部廣東百科全書。

廣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，海外貿易發達。屈大均在海洋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，思想先進，十分關心發展海外貿易，尤其對香山學者黃佐

*黃鴻釗，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。

文藝研究

通市舶疏深表敬佩。

廣東海外貿易一向在平和環境中發展著，但是1522年屯門之戰驅逐葡人後，明朝政府厲行海禁，完全斷絕海舶貿易，造成“百貨蕭然”的局面，使長期從事海外貿易的沿海人民生活大受影響，其中尤以海外貿易較為發達的香山地區所受影響更為巨大。香山學者黃佐有見及此，便公開站出來，撰寫通市舶疏，說明海外貿易的好處，終於扭轉局面，使廣東市舶貿易得以恢復。屈大均援引黃佐的話說，“黃文裕云：往者番舶通時，公私饒給。其貿易舊例，有司擇其良者，如價給之；次則資民買賣，故小民持一二錢之貨，即得握椒，輾轉交易，可以自肥。”屈大均認為這種以民為本，發展海外貿易的觀點十分正確，“廣東舊稱富庶，良以此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15“貨語·諸蕃貢物”）。此後他更加關注香山海外貿易的情況。

16世紀中澳門開放舶口貿易之後，迅速成為“中華帝國最繁榮的港口”，澳門對外貿易欣欣向榮，蜚聲海外，舉世矚目。每年由澳門輸往廣州的貨物，“有歐洲的毛織物，印度的琥珀、珊瑚、象牙、白檀、銀塊、銀貨等物品，其中尤以胡椒一項，為數最鉅。”從廣州購買的貨物有金子、麝香、絲棉、錦緞、朱砂、銅、水銀、白鉛、棉花、粉砂、塔夫綢、優質錦緞、小麥、麵粉、稻子、豬肉、禽、鹹魚、白糖、樟腦、桔皮、大黃、甘草、木料等。其中比較大宗的貿易有絲織品、黃金、香料、工藝品和陶器。據17世紀末歷史家蘇薩談到澳門貿易時說：“僅葡萄牙人每年就從這裡運走五萬三千箱絲織品。每年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條三千二百個，七擔麝香、珍珠、砂糖、陶器”。就連屈大均也讚歎：澳人多富，每船載白金鉅萬，前來廣州十三行做生意。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地語·澳門”）。

屈大均深深感受到澳門廣州間的貿易熱。他寫道：“洋船爭出是官商，十字門開向二洋。五絲八絲廣緞好，銀錢堆滿十三行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15“貨語”）。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望，促使屈大均前往香山和澳門旅遊考察。據

記載，屈大均至少到過澳門兩次。一次是1658年8月間，29歲的屈大均遊澳門。大約在7月底離開廣州赴澳門，約在中秋前返回，前後行程約半月。30年後，屈大均剛剛出版了新著《廣東新語》，便以59歲高齡再次前往澳門，他途經香山，探訪早年的同學和戰友鄭文學，一起追思當年的戰鬥生活和友誼：“與君同學早，四十四年前。白首歡初盡，青春恨未捐。汝師餘碧血，吾道在黃泉。不盡招魂意，同裁大小篇。”（〈香山過鄭文學草堂賦贈〉）。詩中情詞慷慨激越，緬懷參加老師陳邦彥義軍的戰鬥情景，飽含著壯志未申的不盡情意。當時從香山石岐到澳門有渡船直達，屈大均與鄭文學相約從石岐乘渡船到澳門，候船期間，他們遊覽沙崗墟市。“咫尺沙岡市，魚蝦不少錢。蟹黃隨月滿，沙白入春鮮。百貨通洋舶，諸夷接海鮮。渺茫蠓鏡澳，同去恨無船。”（〈香山過鄭文學草堂賦贈〉）隨後他們在前往澳門途中，又遊覽茄頭村（今名岐頭）。一路向南航行，觀賞漁村景色，並在漁家品嚐當地特產生蠔和海鮮。但見“舶口東洋接，潮來百里聞。帆檣爭落日，島嶼亂浮雲。拾鬣雌雄並，開蠔左右分。家家多海錯，邀我醉氤氳。”（〈香山過茄頭村作〉）隨後又來到老萬山，探訪當地居民盧亭人，盧亭是盧循農民軍的後代，他們在萬山群島山上編茅作屋居住，下海捕魚為生。由於長期脫離現實社會，變成荒島野人，雌雄一一皆人形，綠毛遍身只留面，半遮下體松皮青。（屈大均：〈盧亭詩〉，印光任、張汝霖：《澳門記略》）。他們站在屈大均面前，非常熱情地紛紛將魚來獻客。屈大均接受了盧亭人惠贈的大鱸魚，而向他們回贈美酒。最終來到澳門。

屈大均兩次訪問香山澳門，留下了大量詩文，其中最著名的詩有〈澳門〉五律6首，〈望洋臺〉五律1首，〈廣州竹枝詞澳門〉5首。並對澳門的市舶貿易的起源，以及西方文化傳入澳門的情況做了考察，他在1587年出版的傳世名著《廣東新語》一書中，收入了大量澳門文化資料。關於澳門的起源，屈大均這樣說：“凡番船停泊，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。澳者，舶口也。香山故有澳，名曰浪白，廣

百餘里，諸番互市其中。嘉靖間，諸番以浪白遼遠，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。蠔鏡在虎跳門外，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。有南北二灣，海水環之，番人於二灣中聚眾築城。自是，新寧之廣海、望峒、奇潭，香山之浪白、十字門，東莞之虎頭門、屯門、雞棲諸澳悉廢。而蠔鏡獨為舶藪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地語·澳門”）。

屈大均對澳門的看法是複雜的。一方面他認為：“廣州諸舶口，最是澳門雄”。香山澳門率先開放舶口貿易是大大好事，尤其是他親眼見到澳門成為國際貿易中心，港口“洋貨東西至，帆乘萬里風”（《屈大均全集》第2冊《翁山詩外》卷9“望洋臺”。）的繁忙景象，而感到無比高興。另一方面又為澳門葡人盤踞後，成為內地長久的隱患，使他深感不安：由於葡人“築城形勢固，全粵有餘憂”。當然他也知道政府擁有足夠的力量，“肘腋教無事，前山一將功”。《屈大均全集》第2冊《翁山詩外》卷9“澳門”。“一寨在前山嶺，有參將府握其吭，與澳對峙。澳南而寨北，設此以禦澳奸，亦以港臺防外寇也”。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澳門”）。他對中國管治澳門滿懷信心。

隨著澳門港口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，澳門聚集了當時歐、亞、非、美等洲大約二十個國家的商人，成為古代中國罕見的多元文化港口城市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。古老的中國文化不斷增添外來文化的新元素，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的品質。

屈大均親眼目睹澳門開埠後，中西文化交流出現的新氣象，他滿懷熱情迎接外來新文化。他的《廣東新語》薈集了許多西洋新奇器物，集中反映了通過澳門傳入西方文化的盛況。他首先聚焦於西洋火炮與科技產品。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，設火藥局於嘉思蘭炮臺左側，鑄造槍炮，部署在城樓上，以強化澳門的防務。據1626年的記載：當時澳門共有六個炮臺，配置70門大炮。屈大均考察後，對大炮的威力有很深感受，他寫道：“其曰西洋大銃者，重三千斤，大十餘圍，長至二丈許，藥受數石，一發則天地晦冥，百川騰沸，蟄雷震燁，崩石摧山，十里之內，草木人畜無復有生存者。紅毛夷（荷蘭）擅

此火器，載以巨舶，嘗欲窺香山澳門，奪奪市利。澳夷乃仿為之，其制比紅毛益精，安置南北兩臺，以守要害。發時以銃尺量之，測遠鏡度之，無不奇中，紅夷乃不敢犯。用於中土，則誠攻守重器也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16“器語·大銃條”又“機銃條”）。

大炮之外，還有長槍、手槍等數種。其中手槍又名機銃，體積小而威力大，尤其引人注目。“至如機銃者，名覲面笑，弋藏於衣袂之中，而突發於咫尺之際，殺機不測，良可寒心。其制也，小石如豆，齧皮函外，鐵牙摩戛，火透函中，蓋皆精鐵分合而成。分之二十餘事，邈不相屬；合之各以牝牡橐龠相茹，納紐篆而入蝸戶，恬轉相制，機轉相發，外以五六鐵榘榘之，大四寸，圍長六七寸，以帶繫置腰間。帶有銅圈，可插機銃二十枚。鉛彈亦懷於身，用時乃入。彈重八九分，用止二枚不可多，多則壞銃。危急時，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，百不失一，此亦防身之奇技也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16“器語·大銃條”又“機銃條”）。

當時有許多玻璃與玻璃製品傳入澳門。其中有玻璃屏風、玻璃杯、壺、圍棋子、燈。而最普遍的是各種不同形狀和用途的鏡子。屈大均的《玻璃鏡詩》說：“誰將七寶月，擊碎作玻璃。絕勝菱花鏡，來從洋以西。鑄石那能似，玻璃出自然。光含秋水影，尺寸亦空天。”鏡又分為照射鏡，千里鏡（望遠鏡）、顯微鏡、大字鏡、照字鏡等多種。屈大均曾在澳門看到各種功能不同的玻璃器物，歎為觀止，並加以描述：尤其是對千里鏡（望遠鏡）十分贊許。“有玻璃千人鏡，懸之，物物在鏡中。有多寶鏡，遠照一人作千百人，見寺中金仙，若真千百億化身然者。有千里鏡，見三十里外塔尖，鈴索宛然，字畫橫斜，一一不爽；月中如一盂水，有黑紙渣浮出，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，其底碎光四射，如紙隔華燈，紙穿而燈透漏然。有顯微鏡，見花鬚之蛆。背負其子，子有三四；見蟣虱毛黑色，長至寸許若可數。”最使屈大均嘖嘖稱奇的是眼鏡。他說：“玻璃來自海舶，西洋人以為眼鏡。兒

文藝研究

生十歲，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，至老不復昏朦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地語·澳門條”卷15“貨語·玻璃條”）。

此外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中提及其他輕工業品有：鐘錶、刀劍、紡織品西洋布，還有錫器、硫磺、莖文席，香水有花露水，即薔薇水，藥水則有蘇合油、丁香油、檀香油、桂花油、冰片油等，多用瓶裝，在廣東流行。

葡人從海外運入澳門的寵物有獾犬貴和番狗。獾犬貴形狀與狸相似，高足而結尾，分黃白黑三種。葡人珍愛，視之如同子女，臥起必抱持不置。華人受葡人的影響，也把它當做珍貴動物，常以本地特產貨物向葡人求換一隻賞玩。番狗亦即西洋狗，是葡人從歐洲運來的一種玩賞動物，身形矮小，毛若獅子，每隻價值十餘金。此狗備受葡人寵愛，與主人之外，食同餐，寢同眠，屈大均稱澳門人有語曰：“寧為番狗，莫作鬼奴”。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1“獸語”）。

至於傳入澳門的植物有羊桃、蕃荔枝、蕃薯、西洋花草、洋山茶、洋蔥、貝多羅、茶靡、貝多羅、丁香樹，另有橄欖（一名青果）、甜荔枝、酸荔枝等水果，以及紫檀木（紫榆木）、烏木等多種。羊桃又名洋桃，自西洋引進，一蒂數果，大而甘甜。蕃荔枝大如桃，色青，味如波羅蜜。蕃薯，一名甘薯，產於美洲。西班牙人傳入菲律賓，從菲律賓傳入福建，又傳入澳門。廣東人把它當糧食，稱為“薯糧”。澳門的西洋花草有西洋蓮、西洋菊、西洋牡丹和茉莉花。“西洋蓮，蔓如細絲，朱色，花初開如瑩白蓮，十餘出。久之，十餘出皆落年其蕊變而為菊。瓣為蓮蕊為菊，以蓮始而以菊終，故名西洋菊。其種來自西洋，今廣州多有之。”屈大均《西洋菊》詩稱：“枝枝花上花，蓮菊互相變。惟有西洋人，朝朝海頭見。”（《屈大均全集》第2冊《翁山詩外》卷9“西洋菊”）。茶靡產於歐洲。冬天開花，露凝花上，晶瑩芬郁，稱為茶靡露，味甘性涼，舉凡花露均有肌益顏之效，而抹茶靡露尤佳，澳門葡人婦女用以注飲饌。屈大均《茶靡花》詩說：“南海茶靡露，千瓶出此花。

醜顏因白日，醜面即紅霞。色著霏衣客，香歸釀酒家。摘防纖手損，朵朵刺交加。”（《屈大均全集》第2冊《翁山詩外》卷9《茶靡花》）。

屈大均還在澳門仔細考察了葡萄牙人的衣著禮儀、居住環境、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。指出“葡人面甚白，惟鼻昂而目深碧，與唐人稍異。著西裝，男子以黑氈為帽，簷折為三角，飾以鑿花金片，間用藤形，如笠而小，蒙以青絹。相見脫之以為禮。”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澳門”）。衣衫多以羽毛、哆羅、辟支（按：即嘩噠）、金銀絲段及佛山所織洋緞製成。飲食習慣與華人迥然不同，喜甘辛，多糖霜。進餐時，各人圍坐一桌，桌鋪白布，灑以薔薇露或梅花片腦等香水，每人面前置放碗碟刀叉。候黑奴送上食品，各人用飯叉取食，食畢用白毛巾揩手。每週5日葷食，2日素食。葡人進餐後，將殘羹剩飯倒入一個馬槽形的長盤中。這時男女黑奴以手撈食。葡人一般飲用葡萄酒佐餐，通常注入高腳玻璃杯中飲用。

澳門是中外商民雜居之地，其住房形式，中西參混，十分複雜。往往有洋人“已居樓上，而居唐人其下，不以為嫌。”當時中國人一般在平地上蓋平房居住，而葡人則在高地建房。屈大均稱：“其居率為三層樓，依山高下，樓有方者、圓者、三角者、六角者、八角者，肖諸花果形者，一一不同，爭議巧麗相尚。”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澳門”）。葡人建造的房屋式樣又是“高棟飛甍，櫛比相望”。

“葡人重女輕男，由女子操家政，女主人死後亦由女子繼承產業，男子出嫁女家。又樂於同華人通婚，得一唐人女婿，舉澳相賀。”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澳門”）。家有喪事，號哭不過7日，不舉炊，由親友送食品充饑。

葡人信奉天主教甚為虔誠，澳門古教堂甚多，最早的是聖保祿堂，建於1572年至1602年間，中國人稱為三巴寺，又稱為大三巴，在澳門東北部。這些古教堂，在建築風格上具有當時羅馬教廷盛行的“巴羅克”風格。巴羅克（Baroque）一詞起源於葡萄牙語“Barroco”，其藝術特點是

莊嚴高貴、氣勢雄偉、生氣勃勃、有動態感，注重光的效果，擅長於表現強烈的感情色彩。天主教的教區大主教被屈大均稱為“法王”，在澳門有很高地位，屈大均說：“禮拜三巴寺，蕃官是法王。”凡澳門的重大事件或案件，葡人總督及其他官員無法決定，或出現爭議之時，往往投訴於法王，法王作出決定則有如一錘定音。葡人奉之惟謹。法王在澳門市面行走也氣勢非凡，“張蓋樹幡幢，僧雛擁衛之，男女見者輒前跪捧足，俟過然後起。法王或摩其頂，以為大幸。婦女尤信向之。”

澳門宗教節日多，儀式也很隆重。教徒身上都有一個小十字架掛在胸前，每7日一次禮拜，屆時，男女教徒分別到各個教堂去，長跪地上，聆聽神父說教。“山頂有一臺，登道橫貫，常登以望舶。其麓有東望洋寺、西望洋寺，中一寺曰三巴，高十餘丈，若石樓，雕鏤奢麗，奉耶穌為天主居之，僧號法王者司其教。凡番人有罪至寺，法王不許懺悔，即立誅斬；許懺悔，則自以鐵鉤鉤四體，血流狼藉，以為可免地獄之患。男女日夕赴寺禮拜，聽僧演說。”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澳門”）。一年之中，各個教堂均有一次或幾次主辦天主出遊儀式，每次遊行的前夕，先由主辦的教堂派人至龍鬆廟迎奉天主像至本教堂，燃燈達旦。第二天，全澳教徒聚集該教堂，由黑奴擡天主被難像前行，隨後有教童誦聖經，又由教童扮成披著長髮、而有雙翼的天使，來回騰躍。教士手持香燭步隨其後緩緩行進。又由年長的教士手抱耶穌像，隨後有人群簇擁遊行。每年3月15日為天主被難節。教堂鐘沉寂，至17日才恢復鳴鐘之例，在這期間內，澳門所有教徒均不食酒肉。

近代西方音樂也隨著天主教一起傳入澳門。教堂音樂有風琴，中國人稱為“鳳樂”。屈大均介紹這種樂器說：“男女日夕赴寺禮拜，聽僧演說。寺有風樂，藏革櫃中，不可見，內排牙管百餘，外按以囊，噓吸微風入之，有就聲嗚嗚自櫃出，音繁節促，若八音並宣，以合經韻，甚可聽。”（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“澳門”）。

自從16世紀西學東漸以來，屈大均是最早評介

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。在他之前，也有明代大文學家湯顯祖訪問過澳門，並賦詩記述見聞。但此外便沒有更多交集。屈大均則不同，他不止一次親臨澳門，細心考察，寫了具有深度的詩詞，評介澳門風物。又特別關心搜集與嶺南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，將之分門別類編入《廣東新語》一書中。因此屈大均當之無愧是我國評介西方新文化的第一人。

屈大均一貫反對閉關自守，主張實行開放政策，發展海外貿易，對外來文化採取包容和欣賞的肯定態度。他的詩書中還多處提及中西文化在澳門友好相處，相互融合。他在評述西方新文化時，往往情不自禁地詠唱詩詞，表示對新事物的讚歎和喜愛。他兩次遊覽考察澳門，同許多西方人認識和交往，有的人甚至成為好友。一個名叫郭丈的葡萄牙人與他友誼深厚，交往密切。郭丈曾贈送珊瑚筆架給他，屈大均則以贈詩二首答謝。詩中說：

何年沉鐵網，海底得枝枝。
以此為鈎好，偏於掛鏡宜。
親勞如意擊，重向玉臺貽。
才愧徐陵甚，難為筆架時？
分來烽火柏，持作筆床先。
小架宜斑管，長書得錦箋。
歸憑纖手潤，益使大紅鮮。
未有瓊瑤報，殷勤奏短篇。

（《屈大均全集》第1冊《翁山詩外》卷8
西洋郭丈贈我珊瑚筆架賦此答之）。

其後郭丈7月過生日，屈大均又特地送去名為〈壽西洋郭丈〉的祝壽詩：

書床花發貝多羅，鸚鵡堂前解唱歌。
明月新生珠子樹，白雲初熟玉山禾。
千年命縷絲能續，七日仙棋箸更多。
最是端陽榴火好，為君流照玉顏配。

（原註：丈新生子，丈生日為端陽之日。）

（《屈大均全集》第2冊《翁山詩外》卷11〈壽西洋郭丈〉）。

從詩中可以看出葡萄牙人郭丈也是文化人，彼此惺惺相惜，頻繁的進行文字相交。他們的友誼一時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話。RC